清史研究前沿·大国边疆之东北亚地区族群互动与明清鼎革

明代行人司行人严从简与东北女真史事

徐　凯

[摘要] 明初设置行人司，是朝廷专掌邦国外交与周边民族事务的官署，其品秩低而权实重。行人奉使，先礼后兵，化干戈为玉帛，作用堪比将帅。嘉靖后期，赐进士出身的严从简，入职行人司六年。为给朝廷拟定涉外及民族之策和出使者提供咨询，他编纂两本著作，即《使职文献通编》《殊域周咨录》，详载明代域外方国和周边部族事迹，其中相关东北女真族史事，弥补了《四库全书》禁毁史事的阙如，对清朝前史研究颇为珍贵。严从简是中国16世纪中外关系和边疆民族史地的一位杰出史学家。

[关键词] 行人司　严从简　《使职文献通编》　《殊域周咨录》　女真

[中图分类号] K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4）–05–0037–10

明代嘉靖、万历年间，行人司行人严从简编纂《使职文献通编》（以下简称《通编》）与《殊域周咨录》（以下简称《咨录》）[①] 两部姊妹篇之作，记载了明朝与域外方国关系，以及周边民族交往掌故。其中记述了明代“东夷”女真的史事，并涉及清先世之踪迹。乾隆时期，编修《四库全书》，各省掀起了查办“违碍”图籍的运动。《咨录》于《违碍书目》榜上有名，而《通编》则未录其中。[②] 严从简利用职司之便，广集内外官私文存，其作史料详实，付梓又早于同代相类之著，对研究14至16世纪的明朝中外关系、周边民族交流，以及探赜女真史与清朝前史，均提供了珍贵史料。

一

明朝初叶，太祖朱元璋为了彰显国威，宣抚四方，屡次派遣“行人”[③] 出使邻国与边区部

[收稿日期] 2024–03–15

[作者简介] 徐凯（1946—　），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京100871，kaixu@pku.edu.cn

① 严从简：《使职文献通编》22卷，明嘉靖乙丑年（四十四年）刻本。《殊域周咨录》24卷，余思黎点校本，中华书局，1993年。

② 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安徽省凡十八次共奏缴七十四种》、《云贵凡四次共奏缴七十四种》，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25、260页。《明史》卷97《艺文志二》收录《殊域周咨录》，中华书局，1974年，第2419页。《续修四库全书》只收录《咨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均未见《使职文献通编》。

③ 行人，古来释义多种，一为使者的通称。《左传》鲁襄公四年：“韩献子使行人子员问之。”注：“行人，通使之官。”[《春秋左传正义》中册，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30页] 一为古官名，掌朝觐聘问。

族。“明兴文命，诞敷宾廷，执玉之国，梯航而至。故怀来绥服，宝策金函，灿绚四出，而行人之辙遍荒徼矣。”① 洪武十三年（1380）六月，为应对外事殷繁的局面，特置行人司，执掌出使域外与安抚边区民族之事，秩正九品。“行人之官职，主于使者也。”② 朱元璋明令，“非皇命不得差使”。行人司“秩虽冗而责实重”，其品秩低而交聘之权重，而其他衙署不得随意差遣行人。二十七年三月，升行人司正七品，“设官四十员，咸以进士为之”。朱元璋认为，以往行人多用孝廉（俗称举人），以其将命四方，往往不称使指，“至是始命以进士为之”。行人司之初，职事纷繁，凡赍捧诏敕、奉使外夷、谕劳赏赐、朝廷祭典、征聘贤才、赈济灾异、执行军务、整点军马等事，尽遣行人差使。③其《奉使条例》有九，军务者、整点大军者，“武事乃居其二”。国家对外征伐，必以行人先赴告谕。诸如，朱元璋欲征缅甸，派遣李思聪诏告该国罢兵；成祖朱棣将讨安南，派遣朱劝令其国赎罪。行人先礼后兵，化干戈为玉帛，以口舌屡建奇功，堪“与将帅相为表里”④。建文年间，惠帝朱允炆罢行人司，将行人隶属鸿胪寺。朱棣即位，复行人旧制，专司奉使。尔后，该司建制虽有更迭，但其衙署之名至明末未变。⑤

嘉靖三十八年（1559）己未科殿试，严从简金榜题名，中三甲，名列 76，⑥ 赐同进士出身，授行人司行人。因仕宦短暂，且不得志，故名不见经传。兹从桑梓等文存寻其姓氏爵里。

万历《嘉兴府志》记载：

> 严从简，字仲可，嘉靖己未进士。初游郡庠，每试辄优。督学孔文谷，有瑚琏明堂之称。既登第，初仕行人。有事乐安王府，以金币馈，悉却不受。上敕以素有风力，转工科给事中，管盔甲厂，稽核严密，奄竖以是衔之，令人密割牙牌，疏请另置。时代藩与县官告讦，奉旨勘伸朝廷法，后发其失牙牌事，谪补扬州同知。时瓜镇民间失盗，因江陵峻法，即解绶归。今士民思之，立碑颂德。为人坦率淳粹，浑厚真诚。生平嗜书不释卷。郡守王公，请修郡志，业已就稿，未及梓行。有《殊域周咨录》二十卷行世。然素不事家产，没之后，仅以清白贻子孙。今议祀乡贤。⑦

万历十二年（1584），户科都给事中萧彦辑《掖垣人鉴》录其简介：

> 严从简　字仲可，号绍峰，浙江嘉兴人。嘉靖三十八年进士。四十四年五月，由行人选工部给事中。四十五年，升刑科右（给事中）。隆庆元年，降直隶婺源县丞，历扬州府同知，免官。⑧

纵观事略，罗缕生平：严从简，字仲可，号绍峰，浙江嘉兴人，生卒年不详。嘉靖己未科考中三甲，赐同进士出身，⑨ 授行人，历任工科给事中、刑科右给事中，授奉议大夫。隆庆元年（1567），为阉宦所陷，贬官婺源县丞，迁任扬州同知，后解绶归故里。其为政清廉，性情耿介，坦率真诚；他一介书生，手不释卷，不事家产，以清白遗子孙。没后，士民颂德，入乡贤祠。严氏从高中金榜，宦海沉浮，至隆庆元年（1567）削秩除名，退居林下，从政计八年。其中自

西周、春秋、战国、汉代均有此官。明代复有行人之官，职司传旨、册封等事。

① 《通编文献通编·外编题词》，第 1 页。

② 《通编文献通编·正编题词》，第 1 页。

③ 以上引文俱参阅《明太祖实录》卷 232，洪武二十七年三月戊申，中文出版社，1984 年，第 874 页。朱元璋命行人选用进士已成定制。永乐元年五月，北平布政司参议成琎卒。成祖朱棣因其“靖难”守城功，“子杰荫行人司行人”。（谈迁：《国榷》卷 13，成祖永乐元年五月乙酉，中华书局，1988 年，第 903 页）遂改乃父成法。

④ 《殊域周咨录·题词》，第 4 页。

⑤ 行人司衙门的变迁，参阅李东阳等敕撰、申时行等奉敕重修《大明会典》卷 117《行人司》，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 年，第 3 册，第 1702–1703 页。以下版本同。

⑥ 朱保炯、谢沛霖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第 2544 页。

⑦ 万历《嘉兴府志》卷 18《乡贤一·严从简》，《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社，1983 年，第 1084–1085 页。

⑧ 萧彦：《掖垣人鉴》卷 14《嘉靖六科之籍》，明万历十二年刻本，第 48 页。

⑨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下册，第 2544 页。

嘉靖三十八年至四十四年，六年效力行人司。他“虽未尝蒙殊域之遣，而不敢忘周咨之志”，[1]以素谙交聘之故事，深悉外国与部族事状，集简编次，日累成帙，先后修竣《通编》《咨录》，记录了明初以来境外之邦与边区部族事迹。其著述虽命运多舛，幸运的是至今尚存。

二

有明一代与北方民族的战争此起彼伏，边区始终未靖，前期是蒙古瓦剌、鞑靼部，后期则为女真（满洲族）。从宪宗成化年间始，女真族势力兴起，尤其是万历四十四年建州左卫指挥使努尔哈赤脱明建国，兵兴辽东，官僚士大夫更加关注东北民族的动向，例如，三任辽东巡抚马文升撰《抚安东夷记》等。嘉靖以来，女真族势头正盛，为此著书立说者日众，多供朝廷治理东北边疆参酌，一时蔚成风气。诸如，张天复《广皇舆考·九边女直考》、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叶向高《苍霞草集·女直考》、傅国《辽广实录》、陈仁锡《无梦园集·山海纪闻》、潘光祖《舆图备考·女直考》、陈继仕《建州考》等百余种，均从不同视角记述了女真行迹、建州女真先世及辽东战事等。乾隆时期，官修《四库全书》，上述图籍等经军机处严格甄审，对这批书籍或删改，或抽毁，或销毁，致使清前史的诸多问题扑朔迷离。

严氏之书编著于建州女真羽翼尚未丰满之时，凸显了其史料价值。《通编》二十二卷，嘉靖四十一年初成，四十四年修讫。《咨录》二十四卷，万历二年修竣，刊布于十一年。那么，其编修目的与如何成书，则尽载书首“题词”之中。《通编·题词》记载：

> 我先正雍丘边子为使职，《昭鉴》一书，上取帝制，旁采经史，凡可为官守之模范者，皆具列焉。盖诚知使职之不易，易而欲《人鉴》于古今以自重者也。其寅恭相协之盛，心不亦美哉！但岁久多诈，间有缺略。予承乏本署，每欲为更定之，而奔走未遑。壬戌之岁，读《礼》草堂，暇则遐览博考，得其梗概，漫录成帙。虽不敢自谓能续先正之笔，而士君子自重其职，下不负清班，上不辱君命。以希子贡之贤，以志宣尼之圣者，边子此意则亦不敢叛也。若夫编辑次第，则稽古逮官，无本不立，故先之以职原，莅官恪职。非礼不行，故次之以仪式。仪式有定制，则守有定居，故次之以公署……如是而君子之能事毕矣。乃统为《使职·正编》。然宇宙内事，皆吾分内，而薄海诸番，秉节宣制，亦行人之守也。故夷戎蛮狄类为《外编》，而使职之全体于是备焉。[2]

《咨录·题词》则云：

> 然一来一往，礼无不答，则所以口衔天语，身驾星轺，报聘宣招，传纶綍之温煦，布生灵之赫濯，而使中国常尊，外夷永顺，固使者职也……由是则暇览旁通，以备将命于上，采风于下者，自当无所不周矣……曩予备员行人，窃禄明时，每怀靡及，虽未尝蒙殊域之遣，而不敢忘周咨之志。故独揭蛮方而著其使节所通，俾将来寅采，或有捧紫诰于丹陛，树琦节于苍溟者，一展卷焉，庶为辞色进退，将命采风之一助也。
>
> 按：是录所辑，多今时事而略于古者……盖汉唐以来，各夷自有成史，不必再赘……若我朝之抚驭各夷者，其文典藏诸私馆，世莫易窥，有苟散见于各帙者，必尽著之，以表国家章程之大，以博臣工经略之猷，只惧其语焉不详，未论其择焉不精也。至其中有杂说一二，亦以原非正史，聊广见闻，如宾筵鼎俎之外，侑以螺头龟脚，参错成味，俾览者解颐，不至端冕而听，惟恐其卧也乎！[3]

---

① 《殊域周咨录·题词》，第 3–5 页。严氏为何未尝出使异域？万历《大明会典》卷 117 记载：“嘉靖二十四年，令出使外国官，务选仪度修伟，不许一概轮差，或所用非人，著该科纠举。”莫非他不够“仪度修伟”，或体质羸弱等，其因未明。

② 《使职文献通编·题词》，第 1–2 页。

③ 《殊域周咨录·题词》，第 3–5 页。

严氏踵武前贤，作《通编》是受雍丘边子《昭鉴》启迪，指明该书“岁久多诈，间有缺略”。每欲修订之，因事繁未做。嘉靖四十一年，“暇则遐览博考，得其梗概，漫录成帙”，“编辑次第，稽古逮官，无本不立”。《通编》二十二卷，“正编”十卷，目次为职原、礼式、公署、受员、贮书、睿命、使范、人物、文艺、绪议，述行人司掌故；“外编”十二卷，目次为东夷上、东夷中、东夷下、南蛮上、南蛮中、南蛮下、西戎上、西戎中、西戎下、北狄上、北狄中、北狄下，记“四夷”之事状。《咨录》则在《通编·外编》基础上，去《正编》行人司故事，“暇览旁通，以备将命于上，采风于下者，自当无所不周”，将《外编》十卷重新删增邦国与部族史事，辑录二十四卷，名曰《咨录》，专记域外国家及周边部族的事迹。

1. 编纂宗旨，咨询外事。其书宗旨有二：（1）为庙堂制定对外政策与整饬边备提供依据。使者行人“身驾星骓，报聘宣招，使纶綍之温煦，布生灵之赫濯”。“中国常尊，外夷永顺[①]。”“因靡及之怀，勤采访之博，盖专以备使臣衔命外邦之猷，而帅臣敌忾干城之策亦具焉。”[②] 显示“天朝”一统独尊，“四夷”来朝，皆仰大明。（2）为奉节使臣参考咨询，以畀同僚便览。“夷戎蛮狄类为《外编》，而使职之全体于是备焉”，“而不敢忘周咨之志”，“质于我侪，以为同寅自重之一助”。[③] “独揭蛮方而著其使节所通，俾将来寅采，或有捧紫诰于丹陛，树琦节于苍溟者，一展卷焉，庶为辞色进退，将命采风之一助也。”[④] 著述之目的清晰可现。

2. 编辑理念，指归“华夷”。以儒家传统的“华夷之辨”思想为指导，《通编》以“然宇宙内事，皆吾分内而薄海诸番，秉节宣制……故夷戎蛮狄类为《外编》”,[⑤] 分列“四夷”：东夷（朝鲜、日本、琉球）、南蛮（交趾、占城、浡泥）、西戎（大宛、哈密、赤斤蒙古）、北狄（鞑靼、兀良哈、女直）。在传统“华夷”观念下，《咨录》仍照“四夷”排列，调整一些国名，如将“交趾”改为“安南”，去掉“大宛”之目等，又增补了列国与部族 28 个，并扩充史事。

3. 编录之法，厚今薄古。《咨录·题词》指明：“是录所辑，多今时事而略于古者，何哉？盖汉唐以来，各夷自有成史，不必再赘，故但揭其大纲，以见立国之由可也。若我朝之抚驭各夷者，其文典藏诸私馆，世莫易窥，有苟散见于各帙者，必尽著之，以表国家章程之大。”[⑥] 根据现存文献，以当朝为主线，用与邦交国的实录之法，“以著一国之始终”的外交史。

4. 采撷资料，史事有本。“编辑次第，稽古逮官，无本不立”，以朝廷“文典”为主，旁及散见卷帙、杂说见闻等，广征博引。如同叔父、吏部尚书严清作《咨录·序》所言：“名以‘周咨’者，因靡及之怀，勤采访之博”。[⑦] 以两书《女直》为例，似分六类：（1）诏令上谕。诸如，明成祖朱棣、宪宗朱见深、世宗朱厚熜等谕旨等。（2）大臣奏疏。比如，兵部侍郎于谦、都御史李秉、兵部尚书余子俊、兵部尚书彭泽等奏文。（3）边臣疏稿。例如，巡抚辽东都御史程信、巡抚袁恺、巡抚辽东马文升疏奏等。（4）边官文论。譬如，武靖伯、总兵官赵辅《平夷赋》，许论《辽东总论》等。（5）官私典藏。如《东汉书》《北史》《文献通考》《元志》等。（6）同人见闻。同仁出使报告、耳闻目睹，“采风于下者，自当无所不周”。[⑧] 两书综合利用“勘讨之略，守御之策，列圣威让之谟，诸臣经画之论”等官私的原始文稿，是同类史著无法比拟的。

严氏之作详载元末明初以来东北建州女真等演进轨迹，为研究清前史提供了稀见史料。1924 年夏，章炳麟之友在书肆上偶得《通编》一书，题记扉页：“《使职文献通编》二十二卷，

---

① 《殊域周咨录·题词》，第 3–5 页。

② 《殊域周咨录·严清序》，第 1 页。

③ 《使职文献正编·题词》，第 3 页。

④ 《使职文献外编·题词》，第 2 页。

⑤ 《使职文献正编·题词》，第 2–3 页。

⑥ 《殊域周咨录·题词》，第 5 页。

⑦ 《殊域周咨录·严清序》，第 1 页。

⑧ 以上引文见《殊域周咨录·题词》，第 5 页。

正编记行人司故事，外编述四夷事状。《明史・艺文志・史部地理类》收录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二十四卷，独此书阙焉。故清抽毁亦不及世，亦无知是书者。溥泉于浙中坊肆得之，以为奇书。余摭其《外编》女真部，参之它书，为《清建国别记》。古者称国史，曰宝书。若斯者非真宝书欤？倘它日处得《殊域周咨录》，其取资，当要广之也。”①章氏参用《通编》等书籍，成文《清建国别记》，时尚未见《咨录》一书。1919 年开始，日本内藤湖南主持编辑出版了《满蒙丛书》九辑，目录存《通编》之名，未刊其书。1931 年 1 月，谢国桢著《清开国史料考》出版，卷三《明代之记载》上说，《通编》“惜未刊行”。1979 年，其《增订晚明史籍考》仍未补录严氏的两部著作，当与未经眼有关。由此可觇严氏两部著作的学术价值。

三

严氏在《通编・外编》中，把明代域外与边地部族划分东夷、南蛮、北狄、西戎四类。《咨录》虽取消类别，以卷分目，但内容无别。他爬梳东北女真族与明廷关系、经济形态、生活方式、风俗物产等，以及建州部等先世、部落迁徙，与周边民族交融等。其内容可分成五类。

1. 再溯女真族源流，追述部族先世事迹。

严氏利用古代“廿一史”等典籍，梳理女真族的来龙去脉，考订明代女真为金国后裔。

《通编・外编》卷十二《女直》记载：

> 女直，古肃慎之地，在混同江之东。后汉谓之挹娄，元魏谓之勿吉，隋唐曰黑水靺鞨。唐初，渠长阿固郎始来朝。开元中，以其地为燕州，置黑水府。其后粟末靺鞨强盛，号渤海，黑水往属之。及渤海浸弱，为契丹所攻，黑水复擅其地，即金鼻祖之部落也。初号女真，后避辽东兴宗讳，改曰女直，臣属于辽，部族散居山谷。至阿骨打始大，易部建国，曰金。灭辽，城辽伪都于渤海上京，至海陵（王）改为会宁府。金亡归元，以其地广阔，人民散居，设水达达等路，军民万户府五，以总摄之。②

与《咨录・女直》引文相校，只是“伪都于渤海上京”句前，少个“城”字；《咨录・女直》在“以总摄之”句后加（又名合兰府），移植了前文。

严氏再次确认了女真族名称，先秦称“肃慎”，汉代称“挹娄”，魏晋称“勿吉”，隋唐称“靺鞨”，宋辽称“女真”，直到明末。考镜氏族源流，阐明建州女真乃金朝后裔。此说比同时代的兵部职方司主事茅瑞征《东夷考略》、较兵部尚书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早五六十年。

女真首领的活动，尤其是建州女真先世的行迹，书中亦有所记。永乐元年，“授督罕河卫令马吉你为指挥”。成化二年（1466），总兵官赵辅将兵围剿作乱女真，“获虏酋指挥苦女等数千”，“寻以遁寇指挥张额的里，率其妻赴军门，哀词乞降”。十四年，“海西兀者前卫都指挥散赤哈上番书”。十六年，“建州贡使郎秃等六十余人过广宁前屯卫”。嘉靖元年，“建州右卫指挥使牙令哈奏称赎送人口有功，比例讨升都督职事”。③这些女真首领的名字为他书所罕见。

建州左卫右都督董山是努尔哈赤的五世祖，书中记述了正统初年至成化初期，他与明廷的战和关系。天顺三年（1459），“建州夷酋董山，结朝鲜谋入寇”。巡抚辽东都御史程信上疏其事，命译者前往诘问。“董山惊，复贡马谢罪”。成化二年，“董山复来朝贡，争席出不逊语，乘是激怒海西夷人寇边，一岁凡九十七次，杀十余万人”。明廷命武靖伯赵辅充总兵官率军分五路进讨，“获虏酋指挥苦女等数千，擒董山，送京师伏诛”。十四年，海西兀者前卫都指挥散赤哈率所部十余人，欲由抚顺关入广宁。守关参将周俊谓海西人素不由抚顺关入，“今熟知此路，恐

---

① 章炳麟：《使职文献通编》扉页“题记”，《章太炎全集》第 1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353–359 页。

② 《使职文献外编》卷 12《女直》，第 1 页。

③ 引文俱见《殊域周咨录》卷 24《女直》，第 733–741 页。

启他日患”。建州蕃部视机，“欲雪董山之忿”，[①] 凭借海西兵势，俱来犯边。可知曾兼管建州三卫事的董山在女真族中余威尚存。

2. 治理女真族策略，“恩威并济”与“随俗而治”。

明初，朝廷对边疆民族统辖之策就定下招抚、分治、贡赏的基调。太祖朱元璋在《谕中原檄》中告之宇内：“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治天下也。”[②] 此即中原王朝以儒家传统的“华夷”观念鄙薄周边民族。永乐三年四月，成祖朱棣针对东北毛邻、兀良哈等不相统属，强凌弱，众暴寡，地方不宁，派遣百户金声传达谕旨：“尔等若能敬训天意，诚心来朝，各立卫，分给印信，授以名分，分赏赐，俾尔世居本土，自相统属。”[③] 具体的措施，政治上，给以“敕书”（亦称“玺书”），封官授爵，申明职守，驻防地方；经济上，发以“勘合”（凭证），持证得以与朝廷贸易。当然，这也包括女真族等。永乐元年（1403），派遣行人邢枢等宣谕，招抚奴儿干地区部族。《咨录·女直》记述：“海西女直、建州女直、野人女直诸酋长，悉境来附。”[④]《通编·女直》亦载：

> 自开原东北，至松花江以西，置卫一百八十四（曰建州、曰必里、曰毛邻等名）、所二十，为站为地面者各七。选其酋长及族目，授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俾仍旧俗，各统其属，以时朝贡。寻复建奴儿干都司于黑龙江之地，设都督、都指挥使等官，与各卫所，不相辖属。……永乐末年，建州夷人前居开原者，叛入毛邻，自相攻杀。宣德间，朝廷复遣使招降之。辽东守臣，遂请以建州老营地居之（老营者，朝廷岁取人参、松子地也），名为东建州。初止一卫，后复增置左右二卫，而夷人不过数千耳，然亦岁遣数各百人，入贡以为常。[⑤]

明廷将女真等族编入卫所，授官通贡，以夷制夷，其目的是“从所欲授一官，量给赐赉，捐小费以弥重患”，以此稳定边区秩序。

正统十四年（1449），乘蒙古瓦剌部也先率兵进犯京师之机，脱脱不花王侵扰辽东，“海西、建州夷人，所在皆起为乱，辽东为之弗靖者数年”。兵部侍郎于谦疏陈，野人女直，各种夷虏之人，俱归附辽东。“近来相率投降者众，朝廷许其自新，推以旷荡之恩，宥其反侧之罪，授以官职，嘉以赏劳”。[⑥] 以安抚野人女真，绥靖边地。

成化二年，建州、海西女真侵边，“一岁凡九十七，杀十余万人”。宪宗朱见深以武靖伯赵辅任总兵官，左都御史李秉提督兵，总统戎师，前往弹压。他指示赵辅等：“建州之虏酋，世受国恩之旷荡，兹乃悖逆，荼毒我边，实罪大而恶极，宜天讨以殄歼。惟渠魁则罔赦，在胁从而悉蠲。”明兵分五路，渡苏子河，直捣“虏巢”，“获虏酋指挥苦女等以千数”。[⑦] 这亦显示明朝治理女真的恩威并施之策略，以此达到“神武大振于穷荒，圣德光被于四表。车书由此而会同，华夷以之而一统”[⑧] 之目的。

3. 女真族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变。

北方民族由于受到自然生态环境与经济形态等因素影响，均形成了各自部族的生计特色。特别是建州女真等为了生存，从元朝中后期至明正统初年，经历四次大规模的艰辛南迁，早已走出深山老林，进入丘陵平原地区，逐渐地完成了旧有生计方式即“养马弋猎为生”向“室居

---

① 以上引文俱见《殊域周咨录》卷 24《女直》，第 735–737 页。

② 张德信、毛佩琦编：《洪武御制全书》不分卷，《御制文集补·谕中原檄》，黄山书社，1995 年，第 267 页。

③《朝鲜王朝实录抄·满蒙史料》第 1 册，《太宗实录》卷九，太宗五年（永乐三年）四月庚寅，景仁文化社，1982 年，第 165–166 页。此段明成祖朱棣谕旨，《明太宗实录》未载。

④《殊域周咨录》卷 24《女直》，第 733 页。

⑤《使职文献外编》卷 12《女直》，第 1–2 页。

⑥《使职文献外编》卷 12《女直》，第 5 页。参阅《明经世文编》卷 33，第 241 页。

⑦ 引文俱见《使职文献外编》卷 12《女直》，第 5 页。

⑧《使职文献外编》卷 12《女直》，第 7 页。

耕田职业”的转型，明廷以此将女真人划分两类，即以农耕为主的“熟女真”，以渔猎采集为主的“生女真”。这是女真族传统社会经济的一次大变革。

早在辽朝灭亡渤海国后，已将北边女真中的“强宗大姓数千户，移置辽阳之南”，“迁入辽阳著籍者，名曰合苏款”，谓之“熟女真”，从事农耕生产。而“居粟沫江（今松花江）之北，宁江（今吉林松原市东）之东北者，地方千余里，户口十余万，散居山谷间”，① 依旧过着渔猎采集的生活，称为“生女真”，未入辽籍。而金朝创立者的完颜氏即出自白山黑水的“生女真”。明初效仿辽代之做法，对建州、海西、野人三部女真族仍分而治之。《通编·外编》记述：永乐七年，“其有愿居中国者，设安乐州于开原，自在州于辽阳，以处之。量授以官，任其耕猎”。② 永乐末年，“建州夷人前居开原者，叛入毛邻，自相攻杀”。宣德年间，“辽东守臣，遂请以建州老营地居之，名为东建州。初止一卫，后复增置左右二卫，而夷人不过数千耳”。正统时，兵部侍郎于谦指出：“辽东总兵等官，就于自在州，并东宁（今辽宁辽阳市老城）等处城堡安插者，动以千数。”③ 这说明从永乐初年至正统时期，在辽东的两个特别州已经安置数千女真人，屋居耕作，力农生产。《外编》引用嘉靖时兵部尚书许论的《辽东总论》之文：

> 我朝改置卫，而于辽阳、开原二城中，设安乐、自在二州，以处内附夷人。其外附者，东北则建州、毛邻、女直等卫；西北则朵颜、福余、泰宁三卫，分地世官，互市通贡。势虽羁縻，形成藩蔽，是以疆场无迤西北之患。……东北（夷）屋居耕食，不专射猎，边警差缓。而西北（夷）则俗仍迤北，虽未尝大举入寇，然窃发颇多。故辽东夷情，与诸镇异，要在随方拊辑，处置得宜。先事戒严，防守不坠。俾恩威并立，足制其心，乃策之上，而俘斩论功，此第二义也。④

被明人称为“熟女真”的建州、海西人，已进入辽东辽阳、开原等腹地，主要从事农耕作业。随着女真部落的向南迁徙，他们已经陆续地进入吉林、辽东经济相对繁荣的地区，生产方式也从渔猎、采集向农业、畜牧业的经济形态转变。

正统二年六月，建州女真已迁徙至兀剌山北隅吾弥府（今辽宁桓仁县五女山北）一带。朝鲜人窥视该地“水岸大野，率皆耕垦，农人与牛，布散于野”。⑤ 嘉靖年间，海西女真哈达部首领王台率部居住静安堡外，“颇有室居耕田之业，绝不与匈奴逐水草相类”。⑥ 这反映了海西女真人的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再迁苏子河流域，农桑两旺。万历二十三年十一月，出使赫图阿拉建州卫的朝鲜南部主薄申忠一目睹耳闻，“所经处无野不耕，至于山上亦多开垦”，“田地品膏，则粟一斗落种，可获八九石，瘠则仅收一石”。⑦ 四十三年四月，建州左卫指挥使努尔哈赤针对广宁总兵官张承胤巡边所言“欲更立石碑，以汝居出为吾地”及“所种之田勿获”，反驳道：“吾世世祖居耕种之地，今令弃之，想尔心变，故出此言也。”⑧ 皇太极针对八旗战争所获财物分配不均，指明：“夫出师征伐，以有土有人，为立国之本，非徒为财利也。至于厚生之道，全在勤治农桑耳。”⑨ 这证明发展农业对清朝国计民生的重要性。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三月，兵败萨尔浒被俘的朝鲜人李民寏，在赫图阿拉生活近一年半，亲见后金的社会状况，其中

---

① 徐梦莘：《三朝北盟汇编》卷 3，重和二年正月十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第 16 页。

② 《使职文献外编》卷 12《女直》，第 3 页。

③ 《使职文献外编》卷 12《女直》，第 3 页。

④ 《使职文献外编》卷 12《女直》，第 11–12 页；此引文与许论《辽东总论》文字有差异，参阅《明经世文编》卷 232，中华书局，1987 年，第 2437 页。

⑤ 《朝鲜王朝实录抄·满蒙史料》第 3 册，《世宗实录》卷 77，世宗十九年（正统二年）六月己巳，第 355–356 页。

⑥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 11《东三边·王台列传》，《四库禁毁书丛刊》第 36 册，北京出版社，1997 年，第 182 页。

⑦ 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潘喆等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 2 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年，第 429、443 页。

⑧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 2，乙卯年（万历四十三年）四月，《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 1 辑，第 332 页。

⑨ 《清太宗实录》卷 65，崇德八年六月己卯。

农业生产形式是："农庄（胡将则多至五十余所），奴婢耕作，以输其主。军卒但砺刀剑，无事于农亩者，无结卜之役，租税之收。土地肥饶，禾谷甚茂。旱田诸种，无不有之。绝无水田，只有山稻。秋后掘窖以藏，渐次出食，故日暖便有腐臭。其土产禽兽鱼鳖之类，蔬菜瓜茄之属皆有之。"[①] 足知农业已经成为建州女真的大宗产业，而自松花江以下至黑龙江一带的"生女真"已"略事耕种"。农业已经成为建州（包含部分海西）女真人的主要生产方式，渔猎采集，如猎取貂皮、采集人参等则为支柱性的副业生产，通过周边贸易换取必要的生产与生活资料。上述史事足以见证严从简关于女真社会变迁之记录不虚。

4. 风俗文化，沿袭传统，部族有别。

《咨录·女直》记载：

> 其俗土气极寒，常为穴居，以深为贵。好养豕，食肉衣皮，冬则厚涂豕膏御寒。夏则裸袒以尺布蔽体。臭秽不洁，作厕于中，环之而居。好勇善射，弓长四尺；矢用楛，长尺八寸，青石为镞。便行船，好寇盗。(《东汉书·挹娄传》) 嚼米为酒，饮之亦醉，以溺洗面，婚嫁男就女家。父母春夏死，立埋之。冢上作屋，令不雨湿。秋冬死，以尸饵貂，貂食其肉，则多得之。(《北史·勿吉传》) 勇悍，食生肉，饮糜酒。杀人不辨父母，众为缚之，俟醒而解散。居山谷自推豪杰为酋渠。(《文献通考》)
>
> 无市井城郭，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设官牧民，随俗而治。有狗车、木马轻捷之便。狗车形如船，以数十狗泄之，往来递运；木马形如弹弓，系足激行，可及奔马，二者止可冰雪上行。(《元志》)
>
> 建州颇类开原。旧俗其脑温江（今嫩江）上自海西江（今松花江），下至黑龙江谓之生女直，略事耕种，聚会为礼，人持烧酒一鱼胞，席地歌饮，少有忿争，弯弓相射。可汗以下，以桦树皮为屋，行则驮载，止则张架以居，养马弋猎为生。其阿迷江至散鲁江颇类河西，乘五板船，疾行江中。乞列迷有四种，性柔刻贪狡，捕鱼为食。著直筒衣，暑用鱼皮，寒用狗皮。不识五谷，惟狗至多，耕田供食皆用之。死者刳腹焚之，以灰烬夹于木末植之。乞里迷去奴儿干三千余里，一种曰女直野人，性刚而贪，纹面椎髻，帽缀红缨，衣绿彩组，惟袴不槿。妇人帽垂珠珞，衣缀铜铃。射山为食，暑则野居，寒则室处。一种曰北山野人，乘鹿出入。又一种住平土屋，屋脊开口孔，以梯出入，卧以草铺，类狗窝。一苦兀，在奴儿干海东，人身多毛，戴熊皮，衣花布。亲死刳肠胃，曝干负之，饮食必祭，三年后弃之。其邻有吉里迷，男少女多，女始生，先定以狗，十岁即娶，食惟腥鲜。[②]

严氏所记女真习俗多属两汉至明前期的嫩江、松花江及黑龙江流域的"生女真"等部族原始风貌。那时他们"不识五谷"，少有农牧生计，主要是依靠"楛矢石砮""养马弋猎""捕鱼为食"等，从事渔猎采集经济为主，特殊的生产方式与自然地理形态由此衍生出独特的衣食住行、嫁娶婚丧等的别样风情。

（1）服饰。女真人喜好养豕，"食肉衣皮，冬则厚涂豕膏御寒；夏则裸袒，以尺布蔽体"。"著直筒衣，暑用鱼皮，寒用狗皮"。他们衣着简陋，夏季裸袒，或用布头，或以鱼皮遮体。奴儿干海东一带，"人身多毛，戴熊皮，衣花布"。而妇女稍有修饰装扮，"纹面椎髻，帽缀红缨，衣绿彩组，惟袴不槿"，"帽垂珠珞，衣缀铜铃"。纹面、椎髻，衣帽多缀垂之红缨、彩组、珠珞、铜铃等，已经成为女人时尚。

（2）饮食。女真人饮食多以肉类为主，嗜酒成习。"食生肉，饮糜酒"，"嚼糜为酒，饮之亦醉"，"食惟腥鲜"。"聚会为礼，人持烧酒一鱼胞，席地歌饮"。这种粗犷的饮食方式是与当时

① 李民寏：《栅中日录等五篇》中《建州闻见录》，《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3辑，第471页。

② 《殊域周咨录》卷24《女直》，第743-744页。

“射山为食”“捕鱼为食”的生产状况相适应的。因而，早期女真三部亦被称为“打牲部”，以别于草原“游牧部”的蒙古族。

（3）居所。女真人“无市井城郭，逐水草而居”。以“射猎为业”，“暑则居野，寒则室处（今称地窨子）”。夏日炎热，他们“以桦树皮为屋，行则驮载，止则张架以居（今叫撮罗子）”。冬季极寒，则“常为穴居，以深为贵”。夏季居所，“臭秽不洁，作厕于中，环之而居”。女真人这种简陋的居住形式是同当地的自然环境相匹配的。尔后，居住有所改进，住平土屋，“屋脊开口孔，以梯出入，卧以草铺，类狗窝”。可见不同季节的“生女真”居住方式变化是较大的。

（4）出行。女真人出行工具，陆路主要以马、狗与鹿为动力，骑、拉、驮、拽，水路以船为主。“养马弋猎为生”。冬季天寒地冻，江河冰封，“有狗车、木马轻捷之便”。其“形如船，以数十狗泄之，往来递运；木马形如弹弓，系足激行，可及奔马，二者止可冰雪上行”。北山野人，“乘鹿出入”。夏秋雨水充沛，河流湍急，出行则多乘船。阿迷江至散鲁江颇类河西，“乘五板船，疾行江中”。女真族的交通用具与“使犬部”（赫哲族）、“使鹿部”（鄂温克族）、“使马部”（鄂伦春族）颇为相同，这是他们生活在同样的自然生态环境中所决定的。

（5）婚丧。女真人性格剽悍，“少有忿争，弯弓相射”；酒醉，“杀人不辨父母”。婚姻则“婚嫁男就女家”。北山野人邻居吉里迷，“男少女多，女始生，先定于狗，十岁即娶”。丧葬之法，父母“春夏死，立埋之。冢上做屋，令不雨湿。秋冬死，以尸饵貂，貂食其肉，则多得之”。乞列迷女真，“死者刳腹焚之，以灰烬夹于木末植之”。奴儿干地区的东海女真人，“亲（人）死刳肠胃，曝干负之。饮食必祭，三年后弃之”。这就是不同部族的婚丧习俗。

当然，此类社会风俗多是从先祖肃慎以降、历经千百年演变而形成的“生女真”与“熟女真”文化特质。东北地域辽阔，山脉纵横，川流不息。明朝人称为“山夷”的建州、海西女真与“江夷”的野人女真，随着生产方式的转变，生熟女真的不断分化，他们的风俗仍存差异。

5. 方物贡品，乡土气息浓郁。

《咨录·女直》亦记录：

> 其产：楛矢、石砮（黑龙江口出名水花石，坚利，入铁可锉矢镞。人将取之，必先祈神）、重楼、金线（长白山）、赤玉、真（珍）珠（阿也苦河、甫里河、□出河出）、金（双城）、麻布、盐（生木枝上，亦有海盐）、阿胶；马、野猪、野牛、野驴、黄猫；虎皮、熊皮、狐狸皮（有黑白黄三色）、海豹皮、驴皮、海獾皮、海猪皮、海牛皮、海狗皮、失剌孙皮（即土豹）、好剌（各色鹿）、殊角（即海象牙）、鲂须、貂鼠皮、青鼠皮、鲸睛、腽肭脐，海东青（五国城东出，小而健，能擒天鹅，爪白者尤异）、鹰、鸮、鸦、鹊、兔、鹘、鲟、鳇鱼、牛鱼（混同江出，大者长丈五尺，重三百斤，无鳞，骨脂肉相间，食之味长），五味子、栗、麦、穄、葵菜。
>
> 其贡：马、貂鼠皮、舍列孙皮、海东青、兔、鹘、黄鹰、阿胶、殊角。[①]
>
> 其进贡来朝，都督许带达子十五人同。

三部女真等族长期生活在兴安岭、长白山、松花江、黑龙江等地域，得天独厚的自然与地理条件，使得这里物产丰盈，品种繁多，别具特色。明廷对内外朝贡者之策，“宣德化而柔远人”，厚往薄来，赏赐丰厚的彩币等物。每年朝贡多在“圣节”（皇帝诞辰日）、“正旦”（正月初一），“每卫许百人”。女真贡品则以“貂皮纯黑”“马肥大者”等为上乘之物。因而，白山黑水之区不仅为王朝的贡品基地，也是与中原地区交易之区，内地富商大贾多辐辏于此。东北地区特殊的边陲位置与物产富饶，自然深得历代王朝统治者的青睐。

综览上述，严从简从政岁时短，官场跌宕，其政绩乏善可陈。嘉靖四十一年至万历十一年，他从出使者的视野，以丰富的域外与边区民族掌故和风尚，编辑了《使职文献通编》与《殊域

① 《殊域周咨录》卷 24《女直》，第 744 页。

周咨录》两部珍本古籍，为研究有明一代国际关系和民族交流保留了罕见的历史资料，尤其是记录早期东北女真族等及清先世与明廷交往的片段，可补《四库全书》禁毁史料的阙如，对探索女真族演进与清前史颇有参考价值。严从简的著述实现了其“俾成一家之言，则就正之心固所愿也”。① 他不愧为我国 16 世纪探研中外关系与边疆民族史地的一位杰出历史学家。

（本文写作中，黄圆晴博士、穆崟臣博士帮助收集资料，特此鸣谢！）

References

Lei Mengchen. *Qingdai gesheng jingshu huikao* (The banned books of each provinces in the Qqing Dynasty), Beijing: Shumu wenxian chubanshe, 1989.

A Ming Dynasty Xingren in the Messenger's Office (*Xingren Si*): Yan Congjian and the Northeast Jurchen's Historical Events

XU Kai (Department of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kaixu@pku.edu.cn)

Abstract: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the Messenger's Office (*Xingren Si*) was established as a specialized agency of the court in charge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and near−neighbor ethnic affairs. It possessed power disproportionate to its low rank. On diplomatic missions, Xingrens as envoys promoted diplomacy before the use of force and turned hostility into friendship. They functioned in comparable roles to military generals. Late in the reign of the Jiajing Emperor, Yan Congjian, who earned a Jinshi rank, served in the Messenger's Office (*Xingren Si*) for six years, providing advice for envoys and council for the court to decide upon foreign and ethnic policies. He complied two books, *Shi Zhi Wen Xian Tong Bian* and *Shu Yu Zhou Zi Lu,* which recorded in detail the deeds and events of the outside countries and ethnic tribes. The relevant historical facts of the Northeast Jurchen his books recorded filled a gap of missing historical information, which was either forbidden or excluded in the process of compiling Si Ku Quan Shu. His books are of exceptional value for research on the pre−Qing history. Yan Congjian is therefore well deserved to be called an outstanding historian of our country in the areas of Sino−foreign relations and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the frontier ethnic groups in the sixteen century.

Keywords: The Messenger's Office (*Xingren Si*), Yan Congjian, *Shi Zhi Wen Xian Tong Bian*, *Shu Yu Zhou Zi Lu*, Jurchen

① 《殊域周咨录 · 题词》，第 5 页。